

# 城市兴衰演变的经济学分析

□刘雅南<sup>1</sup> 邵宜航<sup>2</sup>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随着城市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对城市兴衰影响因素的讨论也日益升温。实际上,一部城市发展史是一部城市职能逐步演进分化的过程,其中,经济功能不断提升壮大,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如今经济繁荣已成为现代城市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对于重新理解和阐释城市的兴衰与演变过程尤为必要。与传统的史学和社会学视角不同,本文结合目前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和城市发展的基本史实,将城市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高度概括为分别对应于时间、空间和精神三个维度的结构转变、集聚效应和城市文化,城市的兴盛和发展正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和高度统一的结果。本文也据此简要讨论了中国城市的主要发展策略。

关键词: 城市史; 结构转变; 集聚效应; 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4)01—0048—08

## 一、城市发展简史——经济功能的升华

在城市史研究中,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sup>[1]</sup>和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sup>[2]</sup>等都是代表性论著。不同作者对于城市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提炼当然见仁见智。在本文,我们将按大致的时间顺序简要讨论世界城市和中国城市发展脉络,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经济功能之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在不断加强。

如相关研究所示,早期城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是威慑作用和宗教影响,在这些城市中,神庙、宗庙和统治者的宫殿一般都位于城市的中心。但上古时代也同样孕育出了商业城市的起源——腓尼基,商业活力成为城市兴起的另一个源头。在经历了希腊城邦及随后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大都市——罗马的鼎盛和没落后,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商业城市再度兴起。意大利的威尼斯被称为“世界的珠宝盒”、阿姆斯特丹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然而,在城市史上早期的商业繁荣与后来工业革命的强大驱动仍不可同日而语,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人类和城市发展史的转折点,正是这场革命,工业城市遍地开花。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始进入“索洛增长”的工业经济时代。对土地依赖程度的减少,使得城市人口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从而打开了城市发展史的新篇章。城市的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开始进入了大都市时代,这与生产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产业组织的出现息息相关。这时,那些昔以为荣的历史悠久的老工业中心不断地受到来自有卫星城的大都市新贵的强力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城市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新一轮的城市战场上,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也开始清晰起来。高居体系顶端的是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它们是国际经济、全球贸易和跨国交易的中心。下一层级的是巴黎、旧金山、洛杉矶等国际性城市中心。目前,这些巨型城市也正在向其边缘地区扩散和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二元经济背景下的增长与发展研究”(71273216/G0301);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式城市化”(12YJC790127)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 1110 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此时,中心城市的普遍模式就已形成,贵族、宗教功能和军队是城市的主要角色,周朝及后来的汉唐创造出的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和以帝国都城为城市绝对核心的中国城市秩序保持着独特的特色和恒久的影响。作为帝国都城的这些城市的时运都主要取决于统治王朝对位置的偏好。从罗马帝国垮台到文艺复兴这段时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兴盛时期,中国的洛阳、长安和开封等都城相继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并且逾千年之久。而中国最初的商业城市繁荣于唐朝,到了宋朝,远洋经济交往的增长刺激了以商业为导向的世界性城市如广州和漳州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的港口之列。宋代开始,商业等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断加大,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未能持续。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到了两宋的后期,中国的文化开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sup>[3]</sup>。这也使得自马可波罗时代“东方代表城市和文明未来”的预言最终破灭,东方城市丧失了稳居世界城市文明史首要地位的机会。在经历了近五百年的相对停滞之后,上个世纪末崭新的中国城市再次迅速崛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兴城市不断的崛起,中国的城市等级体系也在逐渐地形成和演化。

历史上引起城市的兴衰有可能是政治因素、军事与战争、经济重心转移、交通与贸易的变化、资源的开发等各种因素。前述科特金<sup>[1]</sup>把城市兴盛的共同特征高度概括为:神圣、安全和繁忙,实际上这强调了在历史上精神(信仰与宗教)、政治与经济对城市发展的主要作用。但无论从世界还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史都可以看出,一部城市发展史也是一部城市职能逐步演进分化的过程,从早期城市到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再到现代化大都市,经济功能在不断提升壮大,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地位。现今,经济的繁荣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地位最直接的象征。像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这些全球经济中心都并非国家的权力中心。在我国,经济都会也不断兴起,上海和深圳的崛起就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功能。经济之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使城市的发展摆脱了国家权力中心地理位置特殊性的局限与束缚,获得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经济兴衰与城市伸缩密切相联。有鉴于此,以下我们尝试从经济学的视角探窥城市发展的演变机制。

## 二、城市演变的经济学阐释——三个维度的统一

如前所述,经济繁荣之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并业已成为现代城市地位的重要标志。但与此不相称的是,现有大多关于城市发展与演变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城市规划领域或社会学领域,如雅各布斯<sup>[4]</sup>,纽曼和索恩利<sup>[5]</sup>,肖特<sup>[6]</sup>及布鲁格曼<sup>[7]</sup>等等,而注重从经济学视角展开讨论的论著除了波利斯<sup>[8]</sup>和格莱泽<sup>[9]</sup>之外则实难多见,在城市发展的相关论著中,经济职能通常只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讨论。基于此,展开城市发展与演变的经济学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在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中,结构转变和文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而这些因素对于城市的兴衰也同样重要。同时,近期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都开始强调以往经济研究中常被忽视的空间集聚因素。综合目前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城市实际上正是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增长和发展影响因素发生作用的空间载体,我们可以将一个城市发展演变的关键因素高度概括为结构转变、集聚效应和城市文化,城市的兴盛和发展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这些因素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创新也密切关联,而更富有深意的是,这些因素正对应了时间、空间和精神三个维度的高度统一。

### (一) 时间维度——结构转变与产业周期

从时间维度来看,城市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持续的结构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社会呈现农业和农业人口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结构,城市和农村也是处于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非农产业部门不断转移,其中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增加。如今,在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细化,生产过程开始分离,分工逐渐从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进,以服务其他行业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经济活动的高科技化和服务化正成为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产业结构的转变一直持续而从未停止。

在经济学研究中,结构转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早期研究都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现象,即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使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始融合,相关研究努力对宏观总量的增长与经济结构的持续动态演变进行综合解释。在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联的研究文献中,结构转变的动因可分为需求和供给两类(参阅Acemoglu<sup>[10]</sup>)。从需求角度看,结构转变的动因来自于对不同部门产品的非同位偏好,即不同部门产品的需求特征不同,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由此引致经济结构转变。而从供给角度来看,大多研究认为,结构的转变是由经济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率所导致,不同部门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造成了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需求和供给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结构转变,但总的来说,对产品的偏好一般相对稳定,而技术的冲击在工业革命之后则更为频繁,历史上经历的几次科技革命更是推动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1939年,熊彼特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他沿袭了康迪拉季耶夫的提法,把近百余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长波,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重大的创新及应用为标志,划分了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产业革命时期”;第二个长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蒸汽和钢铁时期”;第三个长周期从1897年开始,是“电气、化学和汽车时期”。按此推算,1948年以后,经济开始进入第四个长周期,即“计算机信息技术时期”。每一个康迪拉季耶夫周期大约都持续60年左右,且都对应于一系列不同的核心产业,由此经济周期同时也造就了城市——产业的空间载体转型的周期,城市的发展史进一步证明了,康迪拉季耶夫周期与城市兴衰周期存在高度的同步性。

在第一个长周期和第二个长周期中,世界的核心产业是棉纺织业和钢铁制造业。英国的工业革命摇篮伯明翰在依托其矿产资源,和工业革命初期打造的现代冶金和机械制造工业的基础上,18世纪成为了铁路机车、蒸汽机和船舶的制造中心,并发展为英国的第二大城市。工业革命的另一发源地曼彻斯特,在19世纪初,也以纺织工业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也推动了其他部门,特别是动力、钢铁、交通运输和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这些工业城市的迅速发展使英国成为近代史上的第一强国。同时,19世纪也见证了美国工业化起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城市的成长。第三个长周期以自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象征,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这一时期的核心产业是汽车、电机工程、化学等产业,这些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采取以巨型工厂和大型的纵向一体化的垄断组织为其主要的产业组织形式,这同时也造就了城市的发展进入大都市时代。新兴工业的兴起加速了传统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衰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抢尽风头的城市曼彻斯特等老工



业中心在这一轮长周期中开始走向衰退和没落。

如果要问世界上技术最发达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地区在何处,1890年,没有人会怀疑是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德国的鲁尔区,但是半个世纪以后,同样的问题人们最先选择的答案可能会是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而到如今,这些却都已不再是我们的答案。二战后兴起的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了包括电子、计算机、通信和航空制造和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高科技产业是这一周期中最新的产业形式。在这一轮周期中,城市兴衰演变的速度明显加快,五十年代还在沉睡中的硅谷,到七八十年代已跃升为全球的计算机产业中心。同时,与高科技产业相伴而产生的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型。斗转星移,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已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曾为后起之秀的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都市都失去了他们旧日的活力和辉煌。

毋庸置疑,所有的优势都具有相对性,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个地方越小,越特殊,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其中,技术的进步便是所有经济优势的最大威胁。如今,大凡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城市,比如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矶等国际性大都市都跟随技术进步的步伐顺利实现了产业的适时转型和比较优势的转换,这些城市业已度过其转型的困难期。而在这个产业转型的残酷淘汰中,有些城市迅速崛起,有些城市悄然衰落。其中底特律就是在产业周期中转型失败的一个典型代表,这座城市在20世纪的头50年里依靠汽车工业实现了令人咋舌的暴富,但是此后则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深渊。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极为有限,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形成了漫长的相对停滞的城市发展时期,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就曾占据了整个西方城市发展史头把交椅达四百年之久。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历史,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技术冲击的频繁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迅速提升。如今无论是都市大邑还是城市新贵,要在全球城市竞争体系中稳居一席之地,城市在产业的主动转型方面所做的努力都要远甚从前。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一轮康迪拉季耶夫周期的到来,城市的兴衰史又将面临被再一次改写的可能。

## (二) 空间维度——集聚效应

从空间维度看,城市的兴衰还取决于它是否存在空间集聚效应。空间因素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然而我们却不难察觉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普遍性,欧洲的经济主要集聚地是在以莱茵为中心的蓝香蕉区,美国的经济活动聚集度最高的地方是一条从大波士顿到华盛顿的走廊,实际上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结果。在城市的发展历程中,空间集聚效应的发挥集中体现在产业内部、产业间集聚和城市间集聚三个方面。而结构转型也必须在空间上实现与集聚效应的统一,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历史上,Marshall<sup>[11]</sup>最早探讨生产的空间集聚现象。他指出外部性是决定集聚经济的关键性因素,其后许多学者进行了拓展和模型化,最终把产生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归结为两种类型: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源于Marshall<sup>[11]</sup>的研究,他认为技术外溢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其后Arrow<sup>[12]</sup>和Romer<sup>[13]</sup>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形式化,所以这一外部性经济也被称为MAR型外部性。城市化经济则与多样性相关,也称为Jacobs外部性,Jacobs<sup>[14]</sup>认为当地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多元产业集聚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知识平台,进而产生知识外部性。相关研究还发现,多元产业集聚更能够抵御外生冲击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目前,对集聚效

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领域。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使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sup>[15]</sup>,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地理因素不断被突出和强调。同时,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也已经使得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日益得到关注。在新近权威文献《经济增长手册》<sup>[16]</sup>中,城市化、经济地理与增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其中的相关研究表明要素和产业的集聚产生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而简略而言,不同的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侧重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城市集聚的重要影响,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强调运输成本是决定空间聚散的核心因素。

实践中,留意城市的发展史,就不难看出空间集聚效应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论对应于哪一段长周期,产业都显示出了空间集聚的效率性,空间上的灵活性和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同时这也正是工业和服务业区别于严重依赖土地的农业生产的效率来源。在工业革命起步时期,由于交通运输成本很高,工业的布局要受制于动力来源和市场邻近性。这一时期,规模经济加上邻近煤炭资源——较好地诠释了19世纪英国中部地区、德国鲁尔区的崛起,而19世纪美国的大城市都集中在东北部,因为那里是煤矿和大多数人口所在地。而得益于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下降促使生产越发集中于成本最低的地方,亨利·福特能够在底特律集中生产汽车,主要受益于运输方面的创新。电影产业因运输最终产品的成本极低而得以集聚在某个地区,好莱坞、宝莱坞由此成为国际电影业的中心。进入信息时代后,通信成本的下降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能迅速集中于一个新位置。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集聚仍然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数字化共享,敏感信息仍然需要面对面接触。金融信息尤其如此,美国华尔街的存在即是证明。而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个人接触对创新和创意的产生也至关重要。这些企业的集聚也就是人才的集聚,人才集聚也反过来吸引大企业的集聚,大型管理、咨询、设计、会计公司和广告代理商等被吸引到大城市来,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大城市的中心都存在CBD的原因。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集聚效应的共存对城市成功发展的重要性还可以得到许多实践的印证。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各大城市的新兴产业的集聚效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分工体系,硅谷集聚了微电子、生物技术与风险资本;波士顿集聚了互惠基金、生物技术、软件与网络产业以及风险资本;纽约集聚了金融服务、广告、出版与多媒体产业;飞机设备与设计、软件、金属加工业在西雅图集聚;化工行业则在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两州南部交接处集聚;好莱坞也集聚了影视娱乐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而日本的筑波则是集聚方面失败的典型代表,这座城市本想实现硅谷奇迹的复制,但是即使拥有大量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由于没有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集聚也拥有自我毁灭的能力,比如纺织、钢铁等行业在时过境迁后会形成波利斯所说的“消极产业群”,反而变为城市转型的障碍。因此城市发展还需注重产业多样化。像底特律这样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其抗风险能力往往很差,外部冲击或比较优势的消失就足以改变整座城市的命运。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对所有的城市都应该发展多元模式。多元发展可能降低专业化,从而丧失竞争力。对于专业化和多元化的选择要取决于城市的体量大小,由于大城市能承载许多不同的集群,所以反过来集群也促进了大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受其规模的限制,就要注重与周围大城市的合作以产生集聚效应。

城市间的集聚产生了城市群,现在,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不仅表现为局部范围的城市化以及个

别城市的大都市化,更表现为一种区域范围的城市集群化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群作为国际分工体系和区域要素集聚式发展中一种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也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国际大都市的周围基本都形成了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城市发展与其所处城市群的命运日益休戚相关,强劲的城市群经济是推动圈内城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外围动力,缺乏经济腹地和卫星城的大城市容易在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落败。世界上的著名国际大都市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都拥有以其为中心的城市群,而同时,也有一些规模相当的核心城市共同组成多核心城市群,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与欧洲大陆的兰斯塔德城市群等。纽约的顺利转型就要同时归功于其所处的大城市群、大都市圈等所发挥的集聚作用。

### (三) 精神维度——城市文化

从精神维度来看,一个城市兴衰还有来自文化的重要影响。在经济学的文献中,“文化”一般是指个体与集体的信仰、社会规范以及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受周围环境影响但是变化比较缓慢的个体偏好方面的各种特征<sup>[17]</sup>。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日益受到关注。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探讨,近期,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密切关联。从广义的制度定义来看,文化常常被视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格雷夫<sup>[18]</sup>等认为文化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福山<sup>[19]</sup>指出:文化影响经济是通过影响制度、非正式规则,从而为“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个体提供选择的简化机制、提供“内化价值”以激励或抑制其经济行动等路径来实现的。目前,文化的影响也开始被引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近经济增长的代表性论著《增长经济学》<sup>[17]</sup>中就强调,文化与经济发展、增长的关联性是将来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从国家到城市,文化的影响都贯穿于发展史的始终。

历史上,城市的起源本身就来自于宗教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上的包容性、多元化、创新精神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对一个城市的繁荣至关重要。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罗马的兴起不仅是因为为市民提供了安全保障,科特金<sup>[1]</sup>认为其公民身份的逐渐推广也是罗马超越狭隘的雅典城邦的关键因素。到16世纪早期商业城市威尼斯变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城市,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的海外扩张时代,起初最大的受益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里斯本和后来的马德里都未能因此获得更加长久的收益,文化价值观被认为是这次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西班牙,教会和贵族控制着大部分的商业资本,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被清除之后,剩余的商业中产阶级大都因为缺乏商业经验而不能充分利用其面临的新的商业机会。与此相反,阿姆斯特丹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并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氛围,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可惜的是,到了17世纪后期,荷兰的资本家和以前威尼斯的资本家一样选择成为食利阶层、不再主动进取。不久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更具宗教自由和冒险精神的伦敦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全面的超越。

而在中国,东方都城的辉煌加深了东方人长期存在的优越感。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的专制统治政权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软弱和腐败。这种持续衰颓的过程并非亚洲所特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的贵族阶层。然而,与东方不同的是,欧洲兴起的商人和手工业阶层为城市经济带来了升级。而在东方,专制政权破坏了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同时,在新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开始走向内卷。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城市里,先是意大利,后来在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则开始兴起。中国的



大都市最终丧失了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东方都城在城市文明中的一个时代由此也画上了句号。

对于现代城市而言,文化之于城市兴衰的重要性则更加深入和显著。萨克森宁<sup>[20]</sup>曾提出了旧金山的硅谷与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这两个高科技产业区的著名案例。两个区域都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自上世纪80年代起硅谷的优势更加凸显。萨克森宁认为,二者差异的重要根源在于区域文化,硅谷的区域文化是开放的、水平的和重视时间的,形成了有利于小公司创业的创新氛围。而在128公路地区,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发展相对成熟、内部结构严密、彼此各自独立的大公司,这里的区域文化是封闭的、垂直的和权威的,并不适合以所谓“柔性生产体系”为主的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辉煌古老工业城市纽约和底特律也同样步履蹒跚,但在底特律依旧继续衰退的时候,纽约则凤凰涅槃实现了浴火重生,其中纽约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传统被认为是关键的差异。

另一方面,在现代新型的经济生产方式中,高科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也被世界各大城市作为重点和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同时传统制造业也面临升级和改造的困境,这些没有哪一个可以与文化的积淀、创意与创新精神相脱离。在现代工业城市严重耗损了人类的环境与资源之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解决城市发展困境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路。可喜的是,近来我国许多历史名城也越来越注重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纷纷提出了文化即城市,城市即文化的发展口号。

### 三、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之路: 延伸讨论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回到在前面提出的问题。城市如何避免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然有了初步的答案。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城市发展取决于结构转变、集聚效应和文化能否实现统一,这也给我国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思路。结合前文分析,本文也从上述三个维度提出我国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相应策略和建议:

其一,产业的主动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业长周期与城市转型周期高度同步,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也促使城市积极主动寻求转型。任何一个产业总会走下坡路,今天的朝阳产业也许就是明天的夕阳产业。能否把握产业演进方向,及时进行转型与升级,是一个城市保持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而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引导责无旁贷。但政府的产业规划与市场机制不能割裂,政府只有在基于国内外市场基础之上进行转型升级方向的选择,才能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对于中国的大城市而言,未来的目标仍应是建立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的经济模式,同时对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大城市,应努力实现制造业的高端化,避免产业空心化。此外,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多元化与专业化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当城市的自身规模难以容纳更多产业集群时,更需注重和周围城市合力打造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让产业链在城市间得到更合理和科学的布局。

其二,集聚效应的追求。现代城市的发展已进入了多中心大都市和城市群的时代,发展大城市,发挥其集聚效应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必然选择。前面提到,集聚效应在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产业集聚、城市群等均是集聚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具体体现。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集聚,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改进都是集聚的主要动力。但城市发展始终要把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放在城市发展工作中的突出位置,通过人才集聚引领产业集聚。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就如格莱泽<sup>[9]</sup>所强调的,城市建筑是城市成功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人才的集聚而不是建筑的集聚才

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这对目前我国许多城市中各类产业园区建设难以形成集聚效应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不论核心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借力地理紧邻,合力推进城市群建设,共谋集聚效应,都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陷入所谓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两极发展模式之争的我国城市而言,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才是合理的中庸之道。

最后,城市文化的培育。在前述科特金的研究中指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和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裕,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保持文化上的外向性和包容性以及始终如一的创新精神是吸引和留住人才、从而保持城市繁荣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其经济发展过程应同时注重文化的软、硬件建设,要着力建造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文化体育设施、兴办教育,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以营造城市的文化环境,在打造城市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应维护文化的“兼容并蓄”、培育市民自由、创新精神,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意识。同时,还要注重现代的城市文化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合一的思想,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协调和统一。

我们相信上述三个维度统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载体。

#### 参考文献:

- [1] 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修订版)[M]. 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2]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M]. 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 [3] 刘子健.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M]. 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4]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5] 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 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M]. 刘晔、汪洋俊、杜晓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6] 约翰·伦尼·肖特. 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M]. 郑娟、梁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7] 杰布·布鲁格曼. 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M]. 董云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8] 马里奥·波利斯. 富城市,穷城市:城市繁荣与衰落的秘密[M]. 方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9]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的胜利[M]. 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10] ACEMOGLU, D.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1]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Acmillan, London, 1890.
- [12]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 155 – 173.
- [13] 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1002 – 1037.
- [14] 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New York: Vintage, 1969.
- [15] COMBES, P., MAYER, T. and THISSE, J. 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6] AGHION, P. and S. DURLAUF (eds. ).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M]. North Holland, 2004.
- [17] 菲利普·阿格因,彼得·豪伊特. 增长经济学[M]. 杨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8] 阿夫纳·格雷夫. 制度和现代经济之路. 吴敬琏主编,比较(29)[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 [19] 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 – 对社会财富与繁荣的创造[M]. 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 [20] 安纳利·萨克森宁. 地区优势[M]. 曹蓬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收稿日期: 2013—09—16 责任编辑: 谭晓梅)